



君子反求诸己

□王蒙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一件事情办好了，一个机遇出彩了，一样成绩成功与彰显了，靠的是什么呢？

一件麻烦挡路了，一个不实的说法给你抹了黑，一个你本来认为你做起来必成无疑的差事，你没有机会了，你受到误解或冷遇了……怎么办呢？

孔子说，如果你是君子，机遇来了，你首先要考虑自己准备好了没有，自己的德行、学识、本领、功夫，过不过硬，能不能胜任乃至游刃有余？你有哪些不足短板需要立即弥补乃至“恶补”、需要调整匡正、需要充实提高？你需要沉下心来，端正态度，给自己出考试题、留作业；而绝对不允许心浮气躁、自吹自擂、得意洋洋、皮毛卖弄、谋取私利。一切机遇、一切成绩，是光耀，也是危殆，是阶梯，也是陷阱，不容你掉以轻心、形式过场、坑人坑己。

遇到不顺、失利，君子会先想到自己的责任，自己不可能完

全没有的缺失、失误，大意失荆州、昏招出洋相，然后总结经验教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屡败屡战，步步提高，争取改进。

而如果是小人呢？好事坏事，他想到的是背景，是他人，是一切借助权势幸运关系学，是人为地拔高自身，是紧跟贵人以求援手。小人本人没有一技之长，不学无术，手里不出活儿，还要伸手讨要，因人成事，厚颜少耻，磨磨唧唧，不知自重。

小人的世界观也是“求诸人”三个字。沉浮上下，成败利钝，功过是非，在小人看来，都决定于背景运气他人关系学。好事成就，都是夤缘时会、攀附高枝，三亲六故、山头同乡、利益输送的果实。而坏事出错碰壁，则是轻忽得罪、八字荒唐、拜谒非人、怀玉不遇的结果。我这里没有用“怀才不遇”的成语，因为小人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无才，他们确实无才无善可陈。而他们的“玉”，不过是钻营投机的鬼机灵而已。小人的特点，是除了不在自己的德性知识、业绩修养、踏实苦干上使劲以外。什么都唠唠叨叨，邪劲用足，废话说够，一事无成，徒添丑态。

那么应该怎样做才是君子之风呢？这方面的意思，传统文化中多以“反求诸己”四个字来表达。反过来说，小人是求诸人的，人生在世，对环境，对他人，对出身，对领导，对部属，乃至对原籍、原校、父母师友、对天时地利人和，都会喷有烦言，嘟嘟囔囔，自己各方面越差，不满就愈多。小人的一切挫折，他们都归咎他人。

“反求诸己”为什么是君子的特色呢？能担当、能自谦、能改过、能学习、能提高、能操作，不论做什么，靠自己的真人品、真本事、真奉献。即使在困难条件下乃至在逆境下，仍然坚持行有益有用之事，做有益有用之人，说有益有用之话，读有益有用之书；能坚持、能再战、能胜利，能面对真实、严于律己；不怨怒、不消极、不乱喷、不泄气、更不咬群，不制造事端与分裂混乱。这当然是君子。不论是谁，归根结底，肯定赞扬的是求己律己的君子，而不可能是怨天尤地、平添晦气的小人啊。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文化部部长）



□夏建圩

志学书院：立志为学 反躬笃践

历史上皖江地区文化教育十分兴盛，尤其在明代中后期，阳明讲学在皖江大地迅速传播，书院数量剧增，开启了文化风气。1563年，罗汝芳在宣城创办志学书院，将心学理念与政治教化结合在一起，“以实心求实学，以实学应实事”，治理效果明显。至清代志学书院虽多次易名，但提倡“笃行”“体用”的风气，一直传承下来。

崇学育才

明代中后期，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王艮等一批心学大家在宣城地区进行讲学活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罗汝芳出任宁国知府。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是大戏剧家汤显祖的老师，其思想对汤显祖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罗汝芳积极倡导讲学，与宣城士绅贡安国、沈宠，以及太平县的周怡，泾县的查铎、翟台、萧良幹等人谈说古今性命之学，使得宣城讲学进入高峰。

嘉靖四十二年，罗汝芳在宣城城内景德寺后陵阳第三峰创建志学书院。“志学”出自《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志学书院中间为大堂，后为会讲堂各五楹，左右号舍四十楹，置田二百余亩，府前地租一十四两有奇，作为供祀及会资。随后宣城县县令姜台在志学书院西、缙绅司右建造了宛陵精舍。志学书院与宛陵精舍成为宣城讲学鼎盛时期的中心，罗汝芳请于巡抚、督学、巡按三台，移文发征租作为讲会供应及王阳明祠祀之需，岁以诸生二人司其出纳，登籍籍复。罗汝芳亲自讲学外，还请致仕乡居的贡安国、梅守德、沈宠三人主讲志学书院，时称三人为“志学三先生”，慕名远来游学者常数百千人。《盱坛直诠》记载了罗汝芳在宣城讲学的部分

内容，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创立志学书院促进了宣城地方文化之风，对儒生的精神启蒙深远。他们后来大多科举入仕。心学思想使得读书人“感动”，继而“发奋”最终“兴起”，转化为进仕的动力。

讲演乡约

明代中后期，一些地方大族及其士绅阶层，在地方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罗汝芳作为地方官吏，关注地方社会治理，在志学书院他写下《宁国乡约训语》，他希望将族约内容以讲会的形式来宣传、落实。

明代自正德嘉靖以后，基层地方的社会治理，尤其是治安问题，主要是通过推行保甲制度来完成的。保甲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惩戒犯禁者方面确有功效，但却不能使民众意识到“不当为”而不愿为之，也就是说，难以从根源上消除人们作奸犯科的念头。

罗汝芳作为泰州学派传人，继承其平民化的特色。在治理地方社会时，罗汝芳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结合现实，将社会上下沟通联系起来。在书院他将“圣谕六言”与《大学》等儒家经典结合起来，并以通俗的语言加以阐发，督促人人遵行，“不惟一身享福利，其子孙亦久久昌炽。若或反道悖德，弗若于训，是乃悞化之顽民，小则不齿于乡，大则必罹于法，而身家亦不能保矣！尚共图之。”在罗汝芳看来，要安靖一方，淳厚风俗，道德教化是必不可少甚至是最重要的手段，这正是他推行乡约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他认为，通过乡约的道德教化，既能收到保甲之效；也能正本清源，端正社会风气，正所谓“敦德礼以洁治源”“萃人心而端趋向”。

罗汝芳经常在志学书院聚集地方大族，讲演《乡约》，将心学理念与政治教化结合在一起。如讲到孝悌的

内容，即使在押的囚犯也参加听讲。宣城当地有兄弟两人，因为家产分配不均，久争不下，导致兄弟反目成仇，官司上诉到罗汝芳案前。罗汝芳正在志学书院讲学，他说：“这里是读书和讲学的地方，要打官司，请到官署衙门去。”兄弟俩坚持不走，罗汝芳说：“要我来评判也行，不过你们要先听完我的课”。于是，安排兄弟两人坐在后排听讲。罗汝芳针对实际情况，临时讲兄弟间应当相互友爱的话题，他动情地说：“当我见到兄弟间友爱恭敬时，就更加欣喜羡慕；而看到兄弟间因为误会争吵冲突，我内心久久不平静。我认为兄弟同根同气，是可以把乖戾转变为和睦的啊！”说完这些话，罗汝芳流下了眼泪。这时兄弟两人忽然互相抱在一起痛哭失声，他们把袖子里写好的讼词，拿出来当众烧掉了。他们自称自己是小人，今天碰上了大贤人，如果不洗心革面，改正自己的罪行，还能算是人吗？并且把争执不下的财产拿出来，用于家族祭祀的祀田。

实际上，罗汝芳没有听，也没有看状词，而是以情动人，感化了他们，多年的积怨冰释瓦解，兄弟互敬互让，重归于好，这是最完美的结局。罗汝芳深知清官难断家务事，正因为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占着理，纠纷才长时间解决不了，最佳的方案就是使得他们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兄弟的情义远甚于利益的争夺，才能从源头解决纠纷。

经世致用

罗汝芳出守宁国府期间，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扑声，且惟讲学水西、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1565年，罗汝芳接受吏部考核，得到“罗宁国真实好官”的评语。不久，罗汝芳父亲去世，他离开宣城回乡守丧。志学书院生员及士民流泪送别，依依不舍。他们沿路唱道：“南北朝时王府君，今明来罗府君，前后相辉德政

均；兄弟争田忽成让，陵阳层峭天下闻。”甚至有人一直追随，将罗汝芳送到江西老家。

在志学书院参与讲学的学者，心学师承关系比较复杂，大多学者至少跟从过两个以上老师讲学，如查铎、张崇、戚充、贡安国、梅守德、沈宠、周怡等人，他们与浙中学派王畿、钱德洪，泰州学派王艮、罗汝芳，江右王学邹守益、欧阳德等，都有交游问学经历。心学不同学派虽在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在良知现成、不离日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

梅守德曾在浙江、山东等地为官，他“以随处体认为真修，以处事当理为应用，以伦常物则为本宗，以反躬笃践为实地”。南陵的汪景认为“圣门之学以身体实践为功，真知自得为贵”。贡安国“穷究性命之理，实践躬行”，教诲弟子“务求实得，毋事空言”。

在志学书院听讲的诸生中，众多人走上仕宦道路，他们先后在各地做官，保境安民是首要任务，道德伦理的教化是经常使用的方法。

志学书院讲学注重亲民、安百姓及百姓日用之道，突出“笃行”“体用”，用程朱之学“实践”修正王学的“虚寂”，从而做到“尊德性而道问学”。

宣城志学书院，是罗汝芳推行乡约治理的重要场所。此后，志学书院多次易名，明万历年间书院先后更名为同仁会馆、正学书院，清乾隆年间又更名为敬亭书院，但经世致用、反躬笃践的风气随时代而转化，代代传承。



发挥出版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范军

出版走出去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出版界着力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积极顺应新形势、新变化，紧紧围绕丝路沿线国际合作的主攻方向，充分发挥重大工程项目、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的重要作用，推动版权、实物、企业走出去不断取得新成效。

新特征：紧紧瞄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主攻方向

“一带一路”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热烈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由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我国出版国际传播的主要对象。在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出版界积极出台政策、设计工程、搭建平台、打通渠道，不断扩大走入丝路沿线的范围和领域，积极采用一国一策分众化方式，使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

出版物和企业源源不断进入丝路沿线，向世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赋能：充分运用重大工程项目和国际书展平台双轮驱动

2014年，“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成为出版界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成为与丝路国家和地区开展出版国际传播的主要抓手。随着工程实施的不断深入，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宽，涵盖的领域愈来愈广。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互译图书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走出去”图书基础书目库和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7大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也纷纷向丝路沿线国家倾斜。这些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出版发行机构“走出去”尤其是走入丝路沿线国家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加强了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之间资源互联互通、内容共同挖掘、渠道共享共用。

作为当今世界国际书展规模第二



大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其规模愈来愈大、效果愈来愈好。这其中，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展数量和版权交易量更是节节攀升。特别是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由中东欧16国组成的主宾国团队集体亮相，成为展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尽管受到全球疫情影响，第2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移至线上举办，但其国际交流合作热情不减，一些核心数据令人瞩目。

我国每年都组织出版机构参加国

际书展。除了参加法兰克福、纽约、伦敦等大型综合性国际书展，还加大参加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书展的力度。相继参加了白俄罗斯明斯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埃及开罗、古巴哈瓦那、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阿联酋阿布扎比、捷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伊朗德黑兰、俄罗斯莫斯科、新加坡、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非亚、泰国曼谷、厄瓜多尔基多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国际书展。

同时，还在丝路沿线国际书展上举办多场中国主宾国活动。如2016年11月在第23届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上的主宾国活动；2017年4月在第27届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阅读中国”的主宾国活动；2018年2月在第27届古巴哈瓦那国际书展上以主宾国身份在拉美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大型国际出版交流盛会；2019年4月在第32届德国黑兰国际书展上的主宾国活动；等等。这一系列主宾国活动，传播了中国价值理念，增进了与丝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出版界相互间的理解认同，塑造了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新进展：大力推进版权、实物、企业“走出去”取得实效

出版物版权输出覆盖范围越来越宽，涉及领域越来越广。在巩固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版权输出的基础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语、希伯来语、尼泊尔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等语种版权输出规模不断扩大。

不管是版权输出还是出版物产品出口，其输出内容结构不断优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用典》等一大批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版物在海外大量发行，引起国际大型出版传媒机构的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国故事丛书）》《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英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等一批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精神风貌的出版物相继出口境外，吸引了大量海外读者；一批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原创文学作品和少儿读物，贴近国外受众的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战“疫”日记》《最美逆行者》《新型冠状病毒来啦！》（图画书）等一批讲述我国抗疫故事，宣介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加快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理念，提振了合作信心、凝聚了世界共识、联通了民心民意。

企业“走出去”数量逐年增多，形式愈加多种多样。我国出版企业积极探索“走出去”持久发展的新模式，相继在境外设立各种分支机构，与海外主流机构合作，开展本土化运营，推广我国优秀出版物。这其中，有国内出版集团、单体出版社、民营出版机构、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建立的中国主题编辑部等；更有一些骨干企业走入丝路沿线国家等。

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真实、立体、全面展现中国的出版物正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